

普通話

普通話教研通訊

第3期

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學院 香港教育研究所第一屆普通話水平測試
證書頒發典禮

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佳教授頒發證書

教育學院院長鍾宇平教授頒發證書

去年11月21及22日，本中心舉辦第一屆普通話水平測試，

該試採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的標準，並應用電腦技術輔助測試，由北京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的國家級測試員評分。1月30日，本中心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書頒發典禮，同時公布測試成績。據資料顯示，應試的262位各行各業人士之中，考獲一級的有27人，佔10.3%，二級的有84人，佔32.1%，三級的有136人，佔51.9%，不入級的有15人，佔6.5%。這個結果，與內地方言區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平均成績相近。

參加是次測試的社會各界人士，包括教育工作者、公務員、文職人員、行政

人員、學生、家庭主婦、自僱人士等。應試的114位學校教育工作者之中，考獲一級的有7人，佔6.1%，二級的有38人，佔33.3%，三級的有62人，佔54.4%。另外，20位專業普通話教師，7位達到一級水平，佔35%，8位達到二級水平佔40%，5位達到三級水平，佔25%。38位文職人員，有4位考獲一級，佔10.5%，11位考獲二級，佔28.9%，19位考獲三級，佔50%。參加測試的行政人員，1位達到二級，10位達到三級。參加測試的8位公務員，其中3位達到二級，5位達到三級。比較不同母語的應試人的成績，顯示考得最好的，依然是普通

話母語者，但也有11.5%只達三級水平，反映他們的語音水平，與標準的普通話仍有距離。廣州話母語者考取成績以三級居多，不過仍有5位考取一級的優異成績，證明廣東人經過學習，同樣可以掌握非常標準的普通話。不入級的15位應試人，雖然全部是廣州話母語者，但只佔10.4%，反映廣州話母語者的普通話水平逐步提升，是個可喜現象。

在發證典禮上，中心主任何偉傑教授表示，根據內地的標準，廣播員與普通話教師應達一級水平；語文教師應達二級水平，公務員應達三級水平。如以這個標準衡量本港教師的普通話水平，顯示本港教師平均普通話水平較低。事實上教師之中，也有兼教普通話的，以三級水平的普通話來進行教學，明顯是不足夠的。另外更值得關注的是，6.1%教師不入級，而專業普通話教師當中，也有25%只達三級，可見無論教師或普通話教師，他們的普通話水平仍待提高。

是次水平測試，參加的文職人員表現不遜於教師，反映文職人員的普通話水平正不斷提升，也顯示社會人士對普通話的重視。另外，參加測試的公務員雖然不多，但他們自動參加測試，表示他們也想檢定自己的普通話水平。何偉傑教授認為推廣普通話，除了在教育系統下工夫外，政府要起帶頭作用。內地已對公務員的普



通話進行評核。據國家人事部規定，1999年入職的公務員，普通話水平應達三級甲等；45歲以下的在職公務員，也要逐步達到這個要求，何教授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考慮為某些職系的公務員設定普通話基準，正如政府為普通話教師、英語教師、使用中文作為教學語言的教師設立基準一樣，使公務員的語言能力要求標準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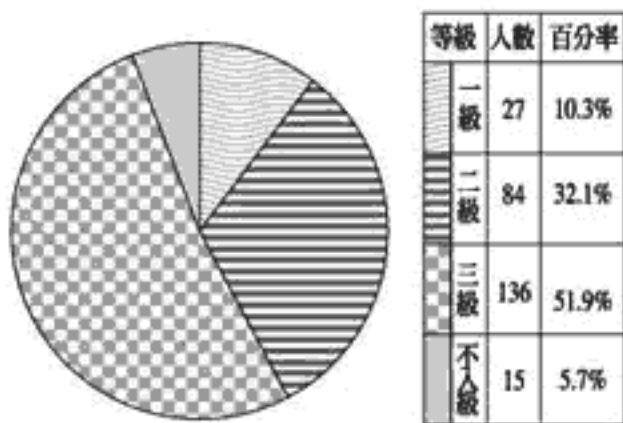
中心副主任林建平教授談到普通話教師的基準試。他認為檢定普通話教師的水平，方向是可取的，但要同時考慮實施成本和培訓機會。他認為老師在權威的普

通話水平測試中取得相當成績，應考慮讓這些老師局部或全部豁免基準試，這樣可大大節省考試和培訓資源。另外，教育當局應重新調配普通話師資培訓的資源，讓不同的院校參與培訓，發展多元的培訓模式，既應盡量讓普通話教師在職前完成培訓和達到指標，又要提高在職普通話教師的普通話能力。長遠來說，治本的方法，仍是改善職前培訓素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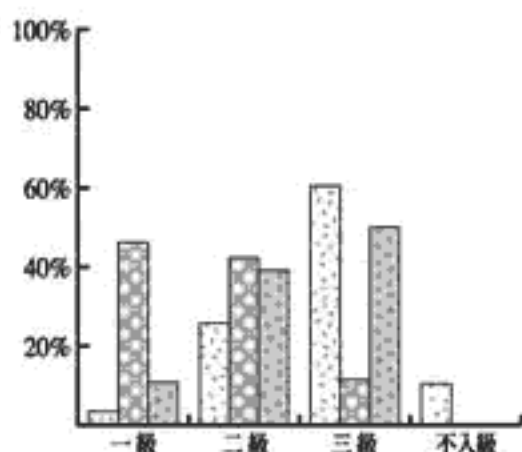
這次水平測試證書頒發典禮，由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鍾宇平教授及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主持。鍾教授表示，教育學院積極參與普通話師資培

訓工作。他認為政府願意提供資源以發展普通話教師基準培訓課程，反映政府重視師資素質，並期望從提升師資素質以改善教學，中大教育學院樂意參與培訓，為推廣普通話而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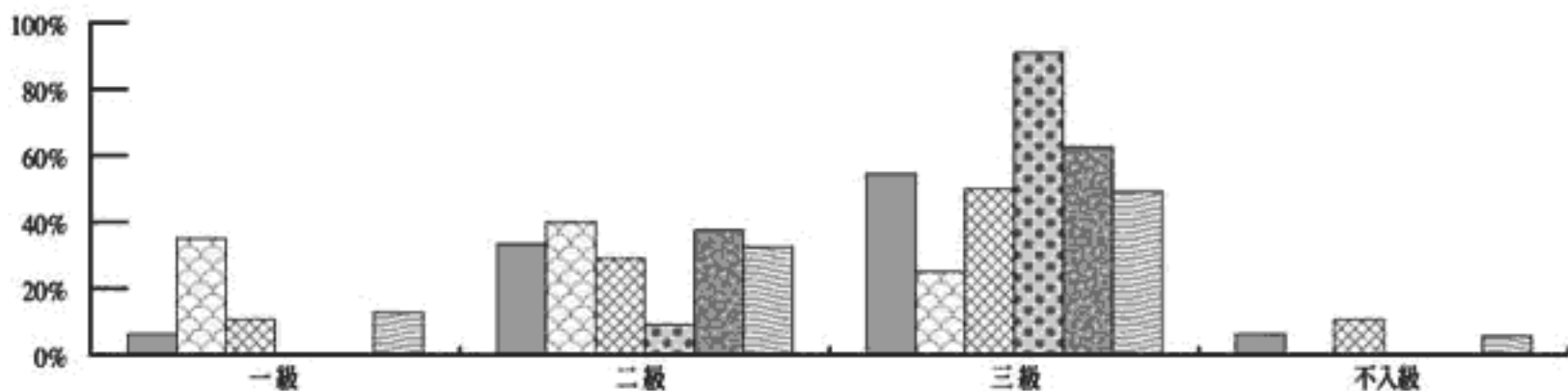
在同一場合，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提到教師培訓和持續教育的問題。他認為現代教育工作者，必須不斷更新知識和提高教學技能；各行各業的人士，也要不斷提高專業修養，以應付各種新挑戰。香港教育研究所繼續與其他單位合作，開辦各種專業培訓課程，以滿足需求。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人考獲等級統計表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人母語與考獲等級統計表



普通話水平測試應試人職業與考獲等級統計表

從“語言與文化”角度探討香港普通話教學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何偉傑

張銳

朱家珏

一、香港普通話教學強調文化因素

一九九八年開始推行的《普通話新課程綱要》(以下簡稱新“綱要”)是一個頗具里程碑意義的文件。其中有的指導意見很有新意，如對普通話課教學不能忽略文化要素的提法就很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新綱要”指出：

語言是交際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學習語言如果只強調工具的掌握，而忽略了文化的學習，仍未能真正掌握該種語言。本港普通話科的教學，一方面使學生掌握語言的技能，另一方面也增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認同感。

從上述“新綱要”要 關於語文與文化的提法，可以看出或引申出對我們普通話教學至關重要的幾點：

1. 普通話教學目標的雙重性

香港的普通話教學目標，一方面應達到學生能聽、能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學習並掌握普通話這個語言交際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也要借此學習中國文化，增強對中國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即香港的普通話教學的目標具有雙重性。

這兩個目標的關係是：既有並列部分、又有兼容部分。並列部分是指“新綱要”中規定除了教普通話本身以外，還要通過普通話認識中國著名風光名勝、傳統文化藝術、傳統節日習尚和典故、俗話等內容。其兼容部分是指把傳統文化知識內容滲透到日常的普通話詞語及表達方式的教學之中，即在介紹某些詞語時不僅是教給學生正確地發音，而且要注意揭示該詞語的國情文化語義。也就是說，把文化要素的教育寓於普通話的教育之中。即是講授有關中國文化的內容，也不是單純的知識介紹，而要跟普通話的聽、說訓練相結合。

2. 普通話教學強調文化要素的針對性

“新綱要”之所以在總綱部分強調文化要素的學習，是針對香港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歷史發展而言的。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一百多年之間，從來不把民族共同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青少年學生也對自己民族文化比較生疏，缺乏民族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所以，強調文化要素的學習，這是香港回歸祖國的大形勢的迫切需要。再有，這也是針對香港普通話教學的實際而言的，即單純地突出工具性的教學目標，忽視了做為語言文化載體的學習，這樣會導至學生不能真正地學好普通話。這裏講的“真正掌握”，我們認為可解釋為：深入地瞭解普通話中的民族文化語義，熟練而得體地運用普通話。

3. 普通話教學強調文化要素的理論依據

普通話文化要素教學的理論依據主要是基於社會語言學、文化語言學和語言習得等方面的理論、原則。概括地講，有以下兩點：

(1) 語言維繫民族、反映民族生活

語言是維繫一個民族的最根本的紐帶，也是民族文化認同的重要標誌。普通話，不僅是漢民族文化重要的載體，也是長期以來漢民族文化沉澱的“活化石”。所以教師教會學生能聽、能講普通話，就不可能脫離開這種語言負載的豐富文化內容。如果教師不教給學生語言背後的中國文化特有的意念、情味，如果學生仍然對這種文化十分陌生，缺乏歸屬感和認同感，那麼教師就不可能真正教好普通話，學生也不可能真正學好普通話。

請看下列：

十丐九儒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
假若馬列今生世，也要揪出滿街走。

(摘自梁漱溟《詠臭老九/桑榆》1994年3月20日)

這首諷諧詩中的十丐九儒涉及語言與典籍文化的知識背景。傳說元朝分百姓為十色：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見陶宗儀《輟耕錄》），讀書人地位低賤，位列第九，僅勝乞丐。臭老九、專政、反動、馬列（指馬克思、列寧）、揪出滿街走（指遊行批鬥，即遊鬥）出現於文革時期，涉及國情文化的範疇。現在，內地的知識分子在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下，對推動中國的改革和社會進步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在提及過去時，也常會以臭老九自嘲，表達一種地位巨大反差的心理。香港學生在收聽內地廣播電視、尋親訪友、參觀遊覽時，總會聽到許多國情文化的詞兒，我們如果能夠有計劃地選編一些常用詞語在教材或安排必要的國情詞語聽說訓練，必將更有效地提高學生運用普通話和中國大家庭成員進行言語交際的能力和水平。

(2) 語言不能脫離語言交際中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要素的規範

社會文化語言學的研究表明：在人際交往中，除了有角色關係、話題、交際媒介等顯性社會要素以外，還有包括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生活習俗、價值觀念等隱性文化要素。而這種文化要素（又稱“文化底蘊”、“文化烙印”、“文化色彩”等），常在語言交際中做為深層結構來規範和制約著著交際用語。

如下面的例子：

例一：一群北京市的紅領巾給年事已高的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先生祝壽，在敬獻鮮花之後，這些少先隊員齊聲對張老先生說：“祝您老長命百歲。”張先生聽了哈哈大笑，說：“孩子們，我謝謝你們！不過，這‘長命百歲’是對小孩兒過滿月、過生日說的吉祥話。對老年人嘛，應該講‘祝您長壽’才是！你們這回知道了吧！”

例二：幾位香港中學生到內地旅遊時有幸到一家工廠參觀。一位工廠辦公室主任介紹工廠情況時有這麼一段話：“過去啊，有好多工人把公物私自拿回家，還說‘外國有個加拿大，咱中國有個大家拿’嘛。”這些香港學生一下子沒聽明白，忙向帶隊的老師求教。老師一時不知如何解釋才是。

上面說的例一，涉及語言與禮儀文化的問題。從詞義上看，“長命百歲”跟“長壽”是同義詞，但傳統的民族文化習慣卻規範它們的用途，“長命百歲”只能對孩子說，不能對老人講，而“長壽”則只對年長者說，不對小孩子講。那樣可愛的少先隊員致的祝壽詞，實際上是一次交際失誤，是由於不瞭解這個詞特有的文化心態造成的。

上述例二，涉及語言與國情文化的問題。內地有個諺語“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意思是說公家的東西不被愛護，想方設法佔為己有，這本是不正之風的一種表現。這句政治諺語中的“大家拿”是採“加拿大”的“大”字挪到了前面，並且以“家”諧音“加”，用換詞序的修辭手法，顯示出一種諷刺、調侃的感情色彩。這段話，除了具有國情文化背景以外，還涉及漢語的諧音文化現象，正是普通話教學不能忽視的文化要素之一。

二、普通話教學涉及的民族文化內容

1. 有關民族文化的典型事例

我們的民族文化不僅源遠流長，而且內容豐厚，在普通話課有限的教學時間，只能選擇最有代表性的典型性的事例子以介紹。“新綱要”列出的就有：中國的傳統節日習俗、傳統文化藝術、著名風光名勝等等。這些內容多以單元課文的形式編入教材，而且圖文並茂，教師易於把握。

2. 具有民族文化內涵的詞語

民族文化詞語，又稱國俗語匯、文化詞類等，指蘊含民族、社會文化含義的詞語。所謂文化含義則是指該民族或社會賦予詞語的引申義、比喻義、聯想義、象徵義、感情色彩與語體色彩以及某些特有的含義。由於這些民族文化詞語跟社會制度的變革和社會生活的變化密切相關，所以它又是動態的、發展的，也是普通話詞語中最活躍的一部分。比如：愛人 àiren(做為名詞性稱謂語，“人”必須念輕聲，以區別於動賓結構的愛人 ài rén，如「我不愛人，只愛自己」)，在1949年以後，泛指“丈夫”“妻子”或“情侶”，不再用“先生”“太太”的稱謂，認為那是資產階級的叫法。再往後，“愛人”一詞的詞義逐漸縮小，用來只稱呼丈夫或妻子，而對未婚人士改稱“對象”或“朋友”。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內地人士跟港、澳、台日益頻繁交往的影響，“先生”“太太”“小姐”“女士”“老板”等過去摒棄的稱謂語又得以復活新生。在大城市，用“先生”“太太”稱呼原來的“愛人”，即“丈夫”“妻子”已是司空見慣的了。原來使用範圍最廣泛的帶革命味道的“同志”一詞，開始呈淡化的趨勢，對某些人士、在某些場合可以改叫其他稱謂語了。但是無論如何，香港人視“同志”為“同性戀者”(如香港曾上映一齣外國影片叫“神父同志”，這個譯名如在內地則是不倫不類的、難以理解的)，這種對“同志”詞義的理解確與中國內地人的理解大相徑庭，教師有必要從國情文化的層面上做些介紹才好些。總之，普通話中有許多民族文化的詞語，特別是國情文化詞語處在悄悄地變化之中，許多新詞兒、新語不斷湧現，也有些詞語正在從人們的口頭消失。所以，做為普通教材的編者和教師應當具有這種敏銳的語感，讓香港普通話教學常教常新。

哪些是民族文化詞語?知名語言學家王德春先生主編了一本《漢語國俗詞典》，他在“國俗語義學與《漢語國俗詞典》·代序”一文中提出民族文化詞語(王德春先生叫國俗語義的詞)細分七種：

1. 反映我國特有事物而外語中沒有對應詞的詞語，如“太極拳”“四化”等；
2. 有特殊民族文化含義及民族文化色彩的詞語，如“青松”表示堅貞不屈等；
3. 具有特殊歷史文化背景意義的詞語，如“七夕”“鵲橋”“牛郎織女”等；
4. 國俗熟語，包括成語、諺語、俗語、警句、格言、歇後語等帶有民族文化色彩的潛在意義，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等；
5. 習慣性寒暄用語，如謙語、招呼語等；
6. 具有修辭意義的人名，如“諸葛亮”表示智慧的化身，“紅娘”指媒人、介紹人等；
7. 兼具兩種以上國俗語義的詞語，如“粽子”既與中國特有的食物(飲食文化)有關，又與祭奠屈原(典籍文化)有關。

王德春先生對民族文化詞語的分類幾乎涵蓋了語言與禮儀、民俗、家庭、典籍、飲食、國情等各個方面文化的內容，該詞典共收詞語三千餘條，既有常見的書面語詞，也有常用的口語詞。但其中的“習慣性寒暄用語”就不只是詞語了，而是指具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口語表達方式，如“您吃了嗎?”“上班啦?”“你慢走!”“請留步。”“您早來了!”等問候語、招呼語、待客語等等。

另一位知名學者胡明揚提出文化因素直接影響語言的學習和使用。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提出以下六種因素與語言教學相關：

- 1 受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制約的詞匯，如“梅雨”“戈壁灘”等；
- 2 受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制約的詞匯，如“饅頭”“四合院”等；
- 3 受特定社會制度制約的詞匯，如“科舉”“支書”等；
- 4 受特定精神文化生活制約的詞匯，如“陳世美”“龍”等；
- 5 受特定的社會風習和心態制約的表達方式，如敬辭和謙詞等；
- 6 受特定的認知方式影響的語言習慣，如認識事物由大到小等。

胡明揚先生指出的上述六種文化因素雖然是對外國人學說普通話而言，但其中有的部分亦適合我們香港普通話教學的需要。比如，“受特定的自然地理環境制約的詞語”這一條也可以從香港許多常用語中可以看到。香港東臨太平洋，四周被水環繞，且地處亞熱帶，終年多雨和航運發達的獨特地理環境，使與“水”有關的詞語特別多，地名如“氹仔”（水坑）、“大清水”、“馬料水”、“淺水灣”、“深水埗”“天水圍”、“大埔滘”（滘，指分支河道），其他如“火水”（煤油）、“水泡”（救生圈）、“水貨”（非正式渠道的貨物，該詞已漸入普通話）、“水皮”（差勁）、“水腳”（路費）、“乾水”（沒錢）、“水緊”（等錢用）、“薪水”（工資）、“補水”（補薪）、“匯水”（匯率）、“揸水”（找錢用）、“掠水”（榨取錢財）、“睇水”（把風）、“散水”（撤走）、“放水”（放錢出來/故意洩露消息）等等。教師把這些香港詞語讓學生譯成普通話詞語的同時，亦可以揭示這種民族文化詞語的某些特殊地理環境背景，讓學生知其所以然。

我們認為，就香港的普通話教學而言，涉及語言與文化關係的詞語大致有如下方面：

1. 普通話中涉及國情文化的詞語，如反映政治、經濟制度、文教衛生生活等方面的用語；
2. 普通話中涉及傳統宇宙觀、倫理觀的詞語；
3. 普通話中涉及典籍文化的詞語；
4. 普通話中涉及家文化和地名文化、花卉文化的詞語；
5. 普通話中涉及飲食文化的詞語；
6. 普通話中涉及宗教文化和禮儀文化的詞語；
7. 普通話中涉及節日文化的詞語；
8. 普通話中涉及民俗文化的詞語；
9. 普通話中數詞、顏色詞的文化語義；
10. 普通話中常用的成語、慣用語、諺語、歇後語及四字格語匯。

上述幾方面是我們學習、借鑒一些學者的研究見解，特別是語言教學工作者的專著，如常敬宇先生的《漢語詞匯與文化》中總結的經驗材料，並結合香港特殊語言環境及普通話教學之需要而提出的。

3. 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及語言習慣

相對於西方人士的表達方式來講，我們確有一些與之不同的、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與話語習慣，如下三例：

中西對表達方式的理解差異舉例

序次	表達方式	中國人的民族心理	西方人的民族心理
一	您吃了嗎？	表示關心、問候。有時不必作答吃了沒有。	是不是邀我共同進餐？會直接作答，“你是約我吃飯嗎？”
二	上哪兒去了？ 幹嗎去呀？	表示關心的問詢語。可不必具體答覆去向，可說“出去一下等。”	這是探聽別人的隱私，有時會讓人反感，聽後可能不高興，或直說上哪兒。
三	買菜呀？	寒暄用語，明知故問，以示關心、問候。	這話毫無意義，或想我買什麼你不必管。

再看另一例：

據說一個中國學生在德國漢堡與一位德國朋友於八月十五賞月。

中國學生：漢斯，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圓啊！我們中國人常說：‘十五的月亮特別圓！’

漢斯：是嗎？這我得問問天文學家他們量過沒有？

本來這位中國學生想表達的是對“團圓月”的思鄉之情，一聽這德國朋友的話，一下子興致全沒了。

由很多表達方式的例証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思維習慣以群體依存為特徵，著重相互關切和自謙尊人，強調感情的溝通；西方人士多以個體為中心，重視個人行動獨立自主和個人領地神聖不可侵犯，西方人士的問候式的表達主要出於禮貌，重的是形式而不是感情。在語言教學過程裏，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和話語習慣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容。就香港的普通話教學來說，像許多謙敬語、禁忌語、委婉表達、禮貌表達、暗示表達、借境(景)表達等都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亦應適當地列為我們的教學內容。

三、香港普通話課有民族文化含義詞語的教學重點

我們認為畢竟香港同胞不是外國人，不能把外國人學漢語的那一套照搬到我們普通話課來。操粵語的香港同胞大多數人的生活方式、習慣、文化傳統都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華人一樣，粵語也是大漢語方言圈中的一支，其“根”是和普通話一個源頭，再加上學的中文課程，看的是中文報紙書籍，很多民族文化詞語在外國人看來不理解，而在港人看來沒問題。所以，我們應慎重地選好普通話課中涉及哪些民族文化內容是要教的。我們認為，下面幾方面可作為教學重點：

1. 港人未接觸過但又比較重要的國情文化詞語

像“四化”、“學雷鋒”、“小皇帝”、“打假”、“糾風”、“計生辦”、“超生游擊隊”等。

2. 同形而異義的常用詞語

即中、港兩地都用一個詞，但這詞的國情語義或文化語義卻大不一樣。教師如果不教，則會造成學生在言語交際中的失誤。例如下表：

詞性	同形詞	香港詞義	普通話語義
名詞	班房 暗室 單位 地牢 地盤 街市 熱氣 死黨 學位 自我 口氣	教室 情婦、外室 單元(住房) 地下室 工地 菜市場 上火 鐵哥們兒(褒義) 學校學生的容納數 自私 口臭	監牢、牢房 洗照片用的有遮光設備的房間。 部門 地下監牢 勢力範圍 商店較多的市區 熱烈的情緒 忠實的走狗(貶義) 專業稱號 自己 言外之意
動詞	報數 暴露 打靶 對打 發達 扶正 檢討 打尖	報賬 衣服穿得過於袒露 槍斃 唱對台戲 發財 將副職擢升為正職 總結、反思 不遵守排隊紀律的行為	排隊報出人數 隱蔽的問題(事物)顯露出來 練習射擊 雙方開打 充分發展 舊指將小老婆扶為正室 對錯誤的認識(貶義) 打尖兒(停下來住宿、休息)
形容詞	圓滑 得意	成熟(褒義) 好玩兒/有意思。	只顧各方討好，不負責任。 (貶義)稱心如意。

3. 蘊含傳統民族文化含義的詞語和表達方式

這類詞語對港人來說有些是生活中本來就有的，如吉利語、口彩等；有些與典籍文化有關的詞語，學生在中文課程中學過，如一些成語、諺語等，即包括本文論述的10種有民族文化含義的詞語。

4. 日常社會交際中的口語詞匯

我們教的是普通話，自然應以口頭語詞為主。書面語詞中也有不少蘊含民族文化含義的語詞，但那是教《中國語文》和《中國文學》老師的領地，我們或可兼顧，但教學的重點還應放在口語詞匯上。

四、總結

語言雖與文化有密切相關，但語言不等於文化。我們教的是普通話，不是單純的傳統文化知識課，不能喧賓奪主。我們強調語言中的文化因素，目的是更好地學好語言，讓學生不僅在語音的平面上學好普通話，也要引導學生在深層的民族文化層面上更準確、得體地學好普通話，並從思想情感深處培養學生熱愛祖國的語言。

主要參考文獻：

陳建民(1989)。《語言文化社會新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德春(1990)。《漢語國俗詞典》。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

胡明揚(1993)。〈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載於《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討論會論文集》。

談談“蝕本”與“折本”

香港城市大學語文學部

李志明

香港人日常講的是廣州話，初學普通話碰到的一個困難，是難以辨別所用的詞語規範與否，也就是可不可以說的問題。即使經過一段時間學習，懂得把廣州話和普通話的詞語對比轉換，但又往往忽略了語體的差異，例如平常說話的書面味道太重，跟口頭用語脫節。學習普通話詞語，有時候需要注意口語和書面語的分別。以下試舉香港人常用的口語詞“蝕本”為例，加以說明。

做生意虧本，香港人叫做“蝕本”。“蝕”粵音多唸sik⁹（食），如侵蝕，腐蝕便是，只有“蝕本”的“蝕”唸sit⁹（屑的低入聲）。一般以為，“蝕本”是粵方言詞，按普通話對應，應該說“賠本”péiběn、“虧本”kuībēn才是。從標準書面語的角度出發，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只要翻查《現代漢語詞典》，就會知道“蝕本”早已進入規範詞語的行列，而且也不特是廣州話獨有的叫法。根據《漢語方言詞匯》，表示“賠本”意思時，除了北京和濟南兩個方言點說“賠”之外，蘇州、梅縣、廣州、陽江和福州都是說“蝕”，合肥、揚州、雙峰和南昌則說“折”，其他如西安、太原等地就“賠”和“折”兩者皆可。

因此，香港人講普通話，說“蝕本”shíbēn本來不成問題，關鍵在於這個詞在普通話裏比較書面語化，口語很少說。廣州話的“蝕本”不但常用，而且非常口語化，對應普通話的話，通常說“虧本”、“賠本”。同樣地，說“折本”shéběn或“折本兒”shéběnr，也是符合口語習慣的。

按《辭源》只收“折本”，沒有“蝕本”。“蝕本”大抵屬後起，甚或本來源自“折本”。折字原來就有虧損之意，例如《漢書·食貨志》說：

“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買取之，毋令折錢。”

所謂“折本”，亦即“賠本”，元朝馬致遠的雜劇《青衫淚》便有：

“稍似閒有些錢，抵死裏無多債，權做這場折本買賣。”

“折”在《廣韻》有旨熱切和常列切兩讀，前者普通話唸zhé，後者唸shé，作虧損義時應讀shé，廣州話則沒有分別，一律唸dzit⁸。

至於“蝕”在古代經傳裏常作“食”，《易經》說：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孟子·公孫丑》也說：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

這裏的“日食”rìshí、“月食”yuèshí，即日月虧蝕，《玉篇·虫部》說：“蝕，日月蝕也”。現在香港不少人就寫成“日蝕”、“月蝕”。既然“食”和“蝕”在這個義項上可以相通，讀音又根本沒有分別，所以兩種寫法都應該可以接受。又“食”在普通話有shí、sì、yì三個讀音：人名用字唸yì，如漢代有酈食其；古代“食”和“飼”相通，凡作動詞用、作供養義時就唸sì。至於唸shí時，指的除了食物、吃等常用義項之外，也包括虧損之意，即今天所說的“蝕”了。

因為“食”“蝕”相通，而“食本”一詞不見於古書，大抵後世事物繁複紛雜，才衍生“蝕”的虧耗、虧缺義。換言之，“蝕本”一詞出現較晚，根據《漢語大詞典》的書證，“折本”出處見於《朱子語類》，而“蝕本”則引自現代作家洪深以及蕭紅的作品，可作為“折本”比“蝕本”較早出現的旁證。

現代很多作家筆下，都有以“折本”入文。例如魯迅的《故鄉》便說：

“種出東西來，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現代漢語詞典》標註“折本”常有兒化，即“折本兒”shéběnr，所舉例句為“做買賣折了本兒”，證明口語亦常用。上引兩個例子中的“折了本”，用廣州話口語說，就等於“蝕咗本”了。

綜合以上所述，可以推想“蝕本”從前原來作“折本”，後來因同義以及音近的關係，受“蝕”的影響而改唸“蝕本”，最後索性寫成“蝕本”。如此或可解釋《現代漢語詞典》裏“蝕本”與“折本”並存的原因。

簡單來說，“折本”出現比較早，現在廣州話口語只說“蝕本”，不說“折本”，甚至書寫也非常罕見。正因如此，香港人在學習普通話時，不懂得可說“折本”，又以為“蝕本”也用於口語。其實在普通話裏，“蝕本”雖然屬規範詞語，但口頭一般不說，反而歷史比較久的“折本”，跟“賠本”和“虧本”一樣，口語仍然是常用的。由此可見，香港人講普通話，如何適當運用口語和書面語詞語，是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教研活動

1998年12月22日至25日，香港教育研究所所長盧乃桂教授、中心主任何偉傑教授、副主任林建平教授前往北京，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進行交流訪問，向語委各領導匯報第一次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的進展情況。何偉傑教授示範操作電腦測試軟件，並聽取該中心老師們的意見。

1998年12月24日，中心主任及副主任拜訪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主任王理嘉教授，雙方就科研合作、編寫教材進行洽談。同時，兩位主任在王理嘉教授的安排下，參觀了語音實驗室。王理嘉教授為他們倆介紹及分析發音原理。

1998年12月24日，中心兩位主任拜訪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張銳教授，就出版教材、研討會安排進行了友好的會面。

1999年1月30日，中心舉辦普通話水平測試講座，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宋欣橋教授主講，題目為：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目標和自我評價。出席的學員對講題很感興趣，研討氣氛熱烈。



何偉傑教授為語委朱新均副主任、傅永和副主任示範電腦測試軟件。



王理嘉教授分析粵語聲調的音高問題。

研討會預告

本中心將於今年5月底舉辦第二屆普通話教育研討會，安排如下：

研討會主題：21世紀標準語教育

研討會日期：1999年5月28日(星期五)至29日(星期六)

地點：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詳情稍後公布。



宋欣橋教授主講：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目標和自我評價。

人事動態

1999年2月，楊惠民女士、張勵妍女士、宣力女士受聘為本中心全職導師。楊惠民女士，遼寧大學文學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資深普通話教師。張勵妍女士，暨南大學文學士，中國語言文學專業；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現代漢語專業，具有豐富編寫普通話教材的經驗。宣力女士，北京語言學院(即現在的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文學士，對外漢語教學專業，在教外國人學漢語方面，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三位老師都是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員。今後本中心的測試工作，將借助她們的專長而進一步擴展。

普通話教研通訊 1999年2月第3期

香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出版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何添樓111室

電話：2609 6749

傳真：2603 7542

電郵：ellie@edu.msmail.cuhk.edu.hk